



哈佛剑桥经济学著作译丛

2

LINDY EDWARDS

HOW TO ARGUE WITH AN ECONOMIST

如何与经济学家争辩

[澳大利亚] 林迪·爱德华兹 著

黄胜强 许铭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哈佛剑桥经济学著作译丛

LINDY EDWARDS

HOW TO ARGUE
WITH AN
ECONOMIST

如何与经济学家争辩

[澳大利亚] 林迪·爱德华兹 著

黄胜强 许铭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4-113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与经济学家争辩/(澳)爱德华兹(Edwards, L.)著;黄胜强,
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哈佛剑桥经济学著作译丛)

书名原文:How to Argue with an Economist

©Lindy Edwards 2002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SBN 7-5004-5408-2

I. 如… II. ①爱… ②黄… ③许… III. 经济理论—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095 号

责任编辑 张 红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插 页 1

字 数 153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 谢

我对下列人员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达伦·赖特，我永远信赖的学术对手；斯蒂芬·弗朗西斯，我的灵感启迪人；以及安德鲁·克莱兰，没有他的信任这个研究项目也许永远不会启动。菲奥娜·雷德韦，她在我研究的每一步都提供了她的干劲、乐观以及可行的解决方案。海伦·麦克拉伦、柯尔斯滕·安德鲁斯、安娜·威尔森、布鲁斯·科恩、简·奥德怀尔、马尔科·萨尔维奥、克莱夫·汉密尔顿、罗斯·安德鲁斯以及那些不愿提及姓名的人，他们为把我的手稿转换为精美的印刷付出了许多。格伦·威瑟斯和米歇尔·格拉顿，他们创造了能使本书结出果实的学术条件。罗斯·吉廷斯，没有他的书写培训我的手稿也许没有人能看懂。还有彼得·德布斯，他让这个项目进展速度加快。我的总理内阁府的同事们，他们给予了我巨大的指导、支持和教诲，对于他们我想强调的是，我在本书中对他们的批评只是学术和哲理性的，但他们一直而且将继续是我最敬重的同事。特蕾西·帕特曼，她在绝大多数不好的时机中承受着我的痛苦中最难受的部分，她在本项目中担子最重。最后是周淑英（音译），她让我擎起这个世界，她给我带来如此多的欢乐。

目 录

致 谢	(1)
-----------	-------

第一部分 历史关头

第一章 政治僵局	(3)
第二章 一个由国家决定的选择	(12)
第三章 经济理性主义左右政府	(21)

第二部分 触摸经济学

第四章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	(35)
第五章 经济学的核心理念	(44)

第三部分 揭示经济理性主义的世界观

第六章 “旁观者”与“经济理性主义者”	(57)
第七章 关于人性的观点对立	(59)
第八章 关于社会如何运行的观点对立	(72)
第九章 关于理想社会的观点对立	(85)
第十章 经济政策与文化	(96)

第四部分 与经济理性主义者争辩

第十一章	如何与经济理性主义者争辩	(107)
第十二章	索回政府责任	(111)
第十三章	关于经济效率的争论	(124)
第十四章	关于生活质量的争论	(140)
第十五章	关于公平的争论	(155)

第五部分 未 来

第十六章	出路	(165)
第十七章	确保“澳大利亚会好的”	(175)
参考文献		(177)

第一部分 历史关头

第一章

政治僵局

“无论您有多么幸运，他们都排在倒数的名次上，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然后，‘Pewft’——9月11日。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位30岁左右的工党御用文人仰面躺在长椅上，脸上挂着男人那种冷漠的笑容，他像许多工党党徒一样，每到实际情况严峻时都在表面上装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在堪培拉的大众酒吧里，各类三教九流的政治知情人——官僚、记者、职业政客——凝视着他们的啤酒，专心致志地在挑选炸土豆片。

片刻之后，另一个政客打破了沉寂。“我不这样认为，我不相信这是一个意外，我不相信值得重新再来一次。”她噘起嘴接着说：“关键是我们的选票太少了。我们在2月的两党选举中曾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因为人民不信任我们，所以大选结果与实际相差甚大。我们现在没有取胜，是由于我们没有接近人民的愿望。”

太多的伤害、挫折和失望，各派别的政治观察家正在争先恐后地打探2001年联邦选举的情况。这场充满恐惧与怨恨的竞选活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沉闷的竞选之一。然而，大选过后正在出现一个共同的话题。这个话题并不是那次危险的、令人担忧的选举，甚至也不是两党领袖的保守主义，而是政治的真空。

竞选政策的空间很有限。两党勉强拼凑的竞选思想毫无价

值。联合执政的主张也无济于事。一个接一个抛出来的政策都只是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再不就是已经实施的计划。工党正在奋力制定基廷时代的议事日程，他们已经接受了惠特拉姆式的就业、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但他们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而是在边缘地带进行局部调整，并且已经遭遇失败，任何一方都没有找到出路。

由于我们的政治精英缺乏创新能力，他们因此为随之而来的大选提供了一个空间。由于没有答案，对竞选辩论的注意力被转移了。约翰·霍华德虽然很关注人民的愿望，但却没有能力给人民带来希冀。由于他的花言巧语正好撞上澳大利亚精神的死角，所以辩论的主题从我们的抱负改变成我们的担忧。我们并未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而是在威胁之中穷于应付。而且，工党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喘息。

由于澳大利亚人一直在寻求对当前政治状况的答案，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政策变化问题。

政策变化

当前的政策变化是潮流变化中的最低潮。澳大利亚正处于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起点。旧的时代已经逝去，政治的双方正在为一系崭新的前进道路而互相争斗。由工党政府发起并由执政联盟继续推行的经济理性主义改革日程业已完成，货物和服务税的实施是最后一项改革措施。作为多年来的第一次，政治的双方都在寻找新的前进方向。

就在政治双方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方向的时候，政治罗盘已经运转失灵了。过去那些区分左翼和右翼的指标也消失无踪，它们之间的巨大分歧封锁了惟一的前进道路。这不是城市与未开垦

的丛林地之间或者工党与自由党之间的分歧，而是澳大利亚人民与其政策制定者之间越来越深的分歧。经济理性主义是个导火索，但它不是一种有关经济的论证，而是价值观和优先权之间的失配。

一方是澳大利亚公众，他们极其厌倦经济理性主义。经历了20年的改革和10年经济增长的最佳时期之后，人们开始不相信经济学会提供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另一方是一群痴迷经济原教旨主义的行政精英。政治家们被搁置在两派的中间，他们已经束手无策，因为争论的理由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急需找到一条出路。然而，这两种观点似乎不可能相互妥协，政治家们随风漂泊在专业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的公众之间的海湾上。

经济理性主义

经济理性主义是涂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支配澳大利亚公共政策界的一系列思想上的标签。一部分人用该词来描述一种把经济考虑置于所有其他价值观之上的思维方式，另一部分人用它来形容一种推崇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我将上述的两种对经济理性主义的诠释综合起来，在本书的第五章中详细阐述我对经济理性主义思想的理解，我将其解释为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简化后得出的一种世界观。

公众的心态

时下的政治僵局已持续近10年之久。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公众不满的报告已经在两大政党内部流传。下院的普通议员

们曾列举过许多公众仇视情绪的轶事。人民已经厌倦了，他们抱怨他们正在失去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在1996年大选初期，自由党的研究发现人民觉得他们正在被遗忘。人民称“堪培拉”不承认他们的优先权，对他们的困境毫无同情感。报纸的民意调查发现：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准备投票给他们感觉厌恶程度相对稍低些的政党。人民不接受两党的观点，也不赞成他们的价值观。

当波琳·汉森像一匹黑马闯进时，政坛为之一震，开始意识到危机出现了。但是，当波琳·汉森获得昆士兰州奥尼地区席位的时候，便让人刮目相看。作为有把握的劳工党席位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自由党候选人，她被推到种族主义的引人注目的中心。她曾给所在地的报纸写过一封反对土著人的信。当这一事件引起全国轰动时，联盟政府的领导人约翰·爱德华不得不把她清除出党以向人数众多的南方选民证明他自己那个颇有争议的种族背景。在后来的竞选造势浪潮中，波琳·汉森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政坛新手，表现出一种对许多有强烈被剥夺感的澳大利亚人深表同情并且敢于暴露自己思想的形象。她为选民们对政府不满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发泄的地方。她作为一个独立的候选人被推上台，在全国赢得票数最多。

汉森建立了她自己的政党——单一民族党并因而震撼了政坛。尽管种族主义使她声名狼藉加剧，但她的讲话却涉及许多澳大利亚人：

就业增长只提供了一些非全日制和临时的工作岗位，而那些有幸得到一份全日制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却不得不不断地延长工作时间来养活他们的家庭、保持他们的家庭不负债。8小时工作时间已成为历史，熟练程度低下、报酬较少的非全日制以及临时的就业岗位的增加是一个令人堪忧的趋势。

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和租房居家。不固定、不连续的工作时间使家庭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无论是自由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包括当前的这伙不值得信任的自私自利的人，他们只谋求支持他们的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并只发给他们工资。（波琳·汉森《澳大利亚议会、议会议事录》）

1997年，单一民族党在昆士兰州的选举中赢得11个席位。对于一个新的政党而言，这是它所获得的最成功的结果。绝大多数的席位是从自由党和国家党手中夺来。政党投票表明，国家党险些被完全挤出将要进行的联邦选举。

议会一片惊慌，各大政党都意识到了公共信任危机的程度，整个国会大厅笼罩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对汉森现象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认为，部分原因是她成功地利用了种族主义，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她善于讨好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厌倦了被忽略，他们受够了经济的发展进程出乎他们的预料和判断。他们抱怨自己的生活质量已经恶化，但却回天乏力。劳工党开始一点点地收回其经济理性主义的花言巧语，霍华德总理也开始告诉人民他理解人民的担忧。

1998年，各大政党联手来平息人民的反对。他们通过利益交换相互妥协，齐心把汉森驱逐出了政坛。自由党的卡梅伦·汤普森尽管得票还不到汉森在第一轮选举中所得票数的一半，但最后还是击败了汉森。妥协之举也使单一民族党在上议院的席位减到最少。然而，尽管我们只能用“乱糟糟”或“不专业”来形容这次选举，但单一民族党在第一轮全国大选中仍赢得9%的票数。对于一个新政党来说，这又是一个创纪录的政绩。

霍华德政府在第二轮选举中明显转右。他没有理睬汉森的经

济政策，而是披上她利用社会不满的外衣。霍华德政府抨击现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只影响极少数人的政策被放大为全国性的问题。媒体也跟着炒作非法移民、骗取福利以及女性同性恋者人工授精等问题。这种狡猾的竞选战略使政府得以表露自己对这些问题不能容忍，而且还不伤及太多的潜在支持者。但这些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经济改革计划还在接二连三地出台，人民还在继续感到不满。随着本届政府进入大选之年，其支持率会继续下降。

经济理性主义者浮起

选民们曾希望，政府的工作目标和公众的关注点之间的差距到工党总理保尔·基廷 1996 年卸任时会消失。基廷因傲慢、冷漠以及普通澳大利亚人无法接近而备受攻击。人们普遍指责他应对经济改革的进程负责，并在 1996 年的大选中齐心合力赶他下台。工党在选举中遭遇惨败，丢掉了 31 个席位，他本人也失去了总理的宝座。

然而，政府的更迭远没有削弱经济理性主义的影响力，反而使它进一步加深。尽管政治风向有迹象表露，但政府的更迭增强了经济理性主义者在政府机构内部的势力。1996 年大选以后，在清除“工党御用文人”的幌子下，一项更新办公地点的计划开始实施。在大权在握的总理和内阁府内，没有经济学背景但社会视野宽广的人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统统被学究式的经济学家所替换。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职员受到被称为“国库部入侵者”势力的压迫。来自诸如“生产力委员会”一类经济理性主义机构的经济学家甚至开始出现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基层。

历经十几年的时间中，这种现象对政府部门的影响非常明

显。1998年5月，霍华德政府停止了其第三轮的大幅预算削减。在公众舆论中，反对党谴责政府实行一种近似于“饿死儿童来支付政治赌注”的政策。但在政府部门内部，观点却是出奇的一致。按照传统，政府各部的社会、经济和产业司局的人员都是从相关的社会、经济和产业部门内招聘的。部门之间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倾向通常都使年度决算报告成为一场火暴的争吵。但那一年却很平静，大家鱼贯而入，静静地听着报告，提了几个没有争议的问题。围绕预算战略的社会公正的剧烈辩论，此次遇到了彬彬有礼的安静。随着人们安静地一一退场，辩论老手们对新的共识感到很不自在。

在公共服务领域，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尽管时下有许多学校毕业生都放弃了经济学学位，但机关职员仍然成群结队地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或堪培拉大学去上经济学课。他们相信，如果没有一个经济学学历，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就走到头了。1999年，社会科学院堪培拉分部是全澳惟一个公布在职教育资格的分部，当问起哪种新的范式将取代经济理性主义时，绝大多数年轻的政府职员都以一副茫然的表情看着你。他们还看不到什么变化。他们仍坚持认为，经济学是分析政府面临问题的惟一方法。

跨越分歧

哪里有不同世界观的碰撞，哪里就有政治。政治家一面用他们的耳朵一面从公众舆论中得到政策精英的谏言，而且他们不得不弥合两者之间的差距。1999年6月，霍华德总理在接受澳大利亚电台采访时让我注意到了他的政府所陷入的两难境地。他说，虽然他不认为更多的政府干预是解决澳大利亚问题的出路，但“社会肯定不会接受政府的退出”。他的讲话引起一片反对的

意见，选民们并不接受政策精英们奉行的理念和政策处方。霍华德总理在电台对话中遭遇的价值观与他每天阅读的政府部门工作报告中反映的价值观之间出现了差距。

在对它缺乏眼光的批评浪潮中，霍华德政府靠招摇撞骗度过了他的第一个任期，靠枪支管制和税收改革来证明它的政绩。直到第二个任期的中期，他才最终独辟一条跨越分歧的蹊径。霍华德发现了一种方法来表达一种能跨越分歧的观点。在对“澳大利亚无限制圆桌会议”的一次重要演讲中，霍华德总理谈到了市场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这两个互补的政策方法。他认为，市场自由主义是参与全球经济的根本，符合保守党的自由主义传统。但他又说，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澳大利亚人应当受到保护。推动变革所带来的成本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并不相等。他认为，在这种迅速变化的时期中向人民提供一个稳固的靠山，这样做符合保守党一贯倡导的保守主义原则。政府需要尽量“减少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并向那些与变革抗争的人提供可行的选择”。

约翰·霍华德的讲话仿佛是对保尔·基廷 1993 年大选获胜时所发表演讲的一种可怕附和。基廷在 1993 年赢得大选后，向“真正的信徒”发出呼吁。他说，经济自由化在现代社会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称工党区别于执政联盟之处在于工党会回过头来收容那些落在后面的人。这会让受到最严重打击的人能好受一些，能让最弱势群体跟上变革的步伐。

执政联盟执政 4 年后，得出了与工党在 6 年前所得出的同样结论，即社会改革与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是殊途同归，两者都奉行自由市场，都同情在转轨过程中受到损害的群体。对于未来的道路，两党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堪培拉的政策精英们是正确的，大家只是没有理解。两党都会得出结论说，民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被弄得不知所措而且没有意识到这全是为了他们好。两党都无休止地说要向选民做更好的“解释”。

尽管对未来道路形成了共识，但分歧依然存在。政治家们知道他们要走向何方并且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无论工党还是自由党都沉溺于“经济第一的政治”，被一个接一个的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经济改革浪潮冲得晕头转向。他们大谈“香蕉共和国”^①、“我们必须面对的经济萧条”以及“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抬出专家，用专业术语、图表和数字灌满选民的脑海，竭力使不受欢迎的改革涂上一层科学的可信外表。政府领导，选民们除了随从，只能在半斤八两之间进行挑选。

由于经济自由化议程的完成，紧张的局势走向高潮。时任工党政府国库部长的保尔·基廷在启动经济改革进程时，确定了经济改革的五大项目：货币浮动和放宽金融监管、削减关税、精简政府机构、取消集中的工资管理以及税制改革。随着霍华德政府税制改革的实施，两党都开始争先恐后地提出一种新观点、一个新日程来把澳大利亚带入 21 世纪。政治家们越是极力用一些新的理念试图抓住澳大利亚人的心和思想，政治分歧就越加严重而无法回避，政治僵局便形成了。

然而，这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界和什么都不懂的“平民百姓”之间的争论，而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争论。澳大利亚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解决这个分歧的方式将决定我们这个民族在下世纪的特征。

① 指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译者注